

丝路景教与汪古渊流^{*}

——从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Text Q 谈起

白玉冬

摘要: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Text Q 反映了蒙元时期曾有突厥语族景教徒在丰州地区活动。上述 Text Q 题记,出自当地的景教徒汪古人之手的可能性最大。汪古人属于回鹘文字文化圈,汪古部五大代表性集团渊流均与西域有关。10至11世纪,包括景教徒在内的西州回鹘辖下粟特系回鹘商人,足迹遍及河西、陇西、漠北、契丹、宋朝内地等。景教在汪古部中的流传,与西州回鹘辖下景教徒商人的活动和景教教团势力的向东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汪古部中虽包括部分沙陀突厥人与回鹘人之后裔,但将其统治阶层视作出自西域的景教贵族,不悖于理。汪古名称可能源自回鹘语 öng“东方、前方”。

关键词: 汪古部; 景教; 回鹘文题记; 叙利亚文

DOI: 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2.015

金元之世,以阴山南北为中心,活跃着一个名族大姓——汪古部,又称白达靺。考古学、历史学、宗教学等领域研究表明,汪古人操突厥语,笃信景教,即基督教聂斯托利派。辽末耶律大石西行,获白达靺首领床古儿接济。在金代,汪古部为女真统治者驻守阴山北麓的界壕。13世纪初,蒙古崛起,汪古部首领阿剌兀思惕吉忽里审时度势,投身蒙古。本文结合笔者对呼和浩特市东郊万部华严经塔(通称白塔)回鹘文题记所作的调查研究成果^①,理清汪古部五大代表性集团的源流,进而对景教在汪古部内的流传问题略抒拙见,并求教于方家。

一、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Text Q 释读

建于辽代的呼和浩特白塔,位于辽金元三代丰州城址,七层八面。塔内至今仍保留有包括汉文、叙利亚文、回鹘文、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在内的一批金元明等代游人题记。关于这些题记,李逸友、曹永年

^{*} 收稿日期:2017—11—26

基金项目: 日本学术振兴会外籍特别研究员奖励金项目“シルクロード史観下の西ウイグル王国史研究—人の移動と文化の伝播を中心に—”(A25033050);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招标课题“高昌回鹘历史若干问题研究”(XJEDU040214B02)

作者简介: 白玉冬,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大连 116081)。

^① 调查日期为2014年4月27日,2015年4月5—6日、8月19日、12月5—6日。白塔文管所杜建中所长对笔者调查给予大力关照,特此致谢。

二位就汉文部分进行了介绍与研究^①。牛汝极则对两条叙利亚文突厥语题记进行了解读^②。P. G. Borbone除对牛汝极研究进行补充外^③,还通过对9条叙利亚文题记的释读,对汪古部的景教信仰和见于题记的人物名 Sārgis “习里吉思”进行了探讨^④。茨默(P. Zieme)则解读了与 Sārgis 相关的另一条叙利亚文突厥语题记^⑤。笔者与松井太就回鹘文题记进行了释读^⑥。另外,松井太在考察蒙元时期景教徒编织的网络时,转引了部分上述回鹘文题记^⑦。



呼和浩特白塔回鹘文题记 Text Q,白玉冬摄于2015年4月6日

下面,笔者依据与松井太的合作研究成果,给出题记 Text Q 的图版、转写(Transcription)、现代汉语

① 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元明各代题记》,《文物》1977年第5期,第55—64页;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考古》1979年第4期,第365—374页;曹永年《从白塔题记看明初丰州地区的行政建置——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之三》,《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第91—99页;曹永年《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明代题记探讨》,《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第11—27页。

② 牛汝极“Nestorian Inscriptions from China(13th-14th Centuries)”,《文化的绿洲——丝路语言与西域文明》,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1—323页。

③ P. G. Borbone, “Syratucica 2: The Priest Sārgis in the White Pagoda”, *Monumenta Serica*, vol. 56, 2008, pp. 487—503.

④ P. G. Borbone, “More on the Priest Sārgis in the White Pagoda: The Syro-Turkic Inscriptions of the White Pagoda, Hohhot”, in: Li Tang & D. W. Winkler(eds.),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Berlin: Lit Verlag, 2013, pp. 51-65.

⑤ P. Zieme, *Altu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Old Uigur Texts of the Church of the East from Central Asia*(*Gorgias Eastern Christian Studies*, vol. 41), Piscataway (New Jersey): Gorgias Press, 2015, pp. 175-176.

⑥ 白玉冬、[日]松井太:《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第31辑,2016年,第29—77页。

⑦ [日]松井太著,白玉冬译《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徐忠文、荣新江主编《马可·波罗扬州丝绸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83—293页。

译文及简单词注 不作讨论① 转写中 为原文中的信札

回鹘文双语瓷质景教碑主人为中亚阿力麻里出身的岳难(Yoxnan)^①。岳难家族后移居济宁,其第4代有名为岳出谋(Yoçumud)者,此岳出谋即源自Yoşumud^②。此处,不能完全排除yoşimut存在上述岳出谋之可能。

2. qīraqiz:可能是基督教徒名Qīryaquz(<Sogd. qwryqws<Syr. qūryâqûs)的变体^③。

上引Text Q题记以景教教会用文字叙利亚文结尾,作者一行中包括基督教徒。虽有部分人名尚难以断定,但上述基督教徒人名的释读确切无误。其中,第5行叙利亚文叙利亚语的解读,承蒙东京大学高桥英海教授赐教。高桥教授还指出,虽然·bdk(‘abdāk)“您(神)的奴仆”之前的文字不清楚,但依据[···]yn w[···]可复原出(‘m)yn w(hyl)“阿门!并且给予我力量”,故该句意思或可推定为“阿门!并且给予您(神)的奴仆菲利普思……力量”。近似的表达方式还见于榆林窟第16窟前室甬道南壁的叙利亚文突厥语题记中。据松井太解读,该题记共7行,是瓜州人伯彦铁木尔(buyan temür)、nātnī‘ēl、约翰(yōhannān)三人来到榆林窟敬拜时所书。其中,第6行末尾至第7行为amin abamuṣa tegi amin“阿门!愿到永远!阿门!”^④,就能够复原出基督教徒祈祷用语‘myn“阿门!”,且从参拜者中出现常见于基督教徒之名的pilipoz、yoşimut而言,上述Text Q题记具有基督教背景。可以肯定,Text Q题记的现有信息,足以让我们了解到书写上述铭文的人物确实在使用回鹘文。

白塔回鹘文题记,多以蒙元时期常见的草书体回鹘文写成。其书写者,包括来自今新疆哈密、昌吉、托克逊等地的畏兀人^⑤。而上引题记以Z代写S(pilipoz),喻示该题记应属于晚期(大体与蒙元时期接近)。据松井太考证,蒙元时期,包括畏兀人在内的突厥人景教徒编织的网络,自东部天山地区直至甘肃、内蒙古,甚至泉州^⑥。另,如前介绍,赤峰松州城遗址出土的叙利亚文、回鹘文双语景教碑主人为中亚阿力麻里出身的岳难,其后代移居济宁。如是,上述Text Q题记作者,存在来自原西州回鹘之地或上述其他地区之可能。不过,白塔所在丰州天德城一带是汪古部的核心之地。据马可·波罗记载,汪古部所在的天德省存在大量景教徒^⑦。而且,汪古部核心城市敖伦苏木故城以及四子王旗王墓梁陵园等地曾出土大量元代叙利亚文突厥语墓碑铭文等^⑧。其中,牛汝极甄别出敖伦苏木故城出土的阿兀刺编帖木刺

① 张佳佳:《元济宁路景教世家考论——以按檀不花家族碑刻材料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5期,第42—46页;马晓林:《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36—137页。

② 马晓林:《元代景教人名学初探——以迁居济宁的阿力麻里景教家族为中心》,《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第139页。

③⑥ [日]松井太著,白玉冬译:《蒙元时代回鹘佛教徒和景教徒的网络》,第289,287—290页。

④ [日]松井太、荒川慎太郎编:《敦煌石窟多言語資料集成》,东京:東京外国語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所,2017年,第100—101页。

⑤ 如Text E与Text J为哈密人所写,Text K与Text L出自托克逊人之手,Text T为彰八里人所留。详见白玉冬、[日]松井太:《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第37、39、40、45页。

⑦ 主要参见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64—165页;A. C. Moule & P. Pelliot, *Marco Polo: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 New York: Ams Press, 1976, vol. 1, pp. 181-183。

⑧ 主要参见[日]佐伯好郎:《内蒙百靈廟附近に於ける景教徒の墓石》,氏著《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2卷,东京:春秋社,1943年,第414—473页;[日]江上波夫:《オロン・スム遺跡調査日記》,东京:山川出版社,2005年;盖山林:《阴山汪古》,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91—199、270—288页;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21、67—102页;Tjalling H. F. Halbertsma, “Nestorian Grave Sites and Grave Material from Inner Mongolia”, “Characteristics of Nestorian Grave Material from Inner Mongolia”, in *Early Christian Remains of Inner Mongolia: Discovery, Reconstruction and Appropriation*, Leiden; Boston: Brill, 2008, pp. 159-213, pp. 219-345; Li Tang, “Nestorian Relics in Inner Mongolia”, i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Verlag, 2011, pp. 76-80。对唐莉论著的书评,见马晓琳:《评〈蒙元时代中国的东方叙利亚基督教〉》,《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9期,2014年,第466—477页。

思墓碑使用文字除汉文、叙利亚文外,还有回鹘文^①。据 13 世纪叙利亚学者把·赫卜烈思(Barhebraeus)著《马·雅巴拉哈三世与拉班·扫马传》^②载,元代自大都前往巴格达拜会景教大主教的景教师有扫马(Savma)和马古斯(Marquus),马古斯出自汪古部辖下东胜。把·赫卜烈思认为马古斯是“回鹘人”。二人在西行途中,在天德城内外的景教寺院得到景教徒的热烈欢迎,并得到爱不花、君不花二位汪古部王子的挽留与接济。另,据 P. G. Borbone 介绍,梵蒂冈图书馆藏有以叙利亚文突厥语写成的汪古部高唐王阔里吉思之妹萨拉公主于 1298 年为基督教东方教会所写的福音书^③。这也就是说,笃信景教的汪古人不仅使用景教教会所用叙利亚文字,而且还使用回鹘文字。鉴于汪古人的上述文化特点,笔者以为,以草书体回鹘文写成,同时出现基督教人名,且以景教教会文字叙利亚文结尾的上述 Text Q 题记,出自丰州天德城一带的景教徒汪古人之手的可能性最大。

综上,Text Q 题记现有的信息,尚不足以断定其题写者一行之所属。不过,结合白塔保留的众多叙利亚文突厥语题记,可以说丰州城内的白塔,不仅是佛教徒,而且还是景教徒的崇礼之地。总之,该题记准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作为景教徒,题写者一行通回鹘文。结合敖伦苏木故城阿兀刺编帖木刺思墓碑与赤峰松州城出土的叙利亚文、回鹘文双语景教碑以及泉州等地出土的景教徒墓碑等^④,我们可以确信,蒙元时期活动在中国境内的景教徒在使用叙利亚文字的同时,也确切地在使用回鹘文字。

诚然,五代宋元时期,回鹘文字通行于中亚、西北多地。即便是景教徒,仅依据使用回鹘文字,仍无法判断其族属。但前面介绍的关于汪古部的信息足以表明,金元时期构成景教社会重要一员的汪古人,同时属于回鹘文字文化圈^⑤。而地处丝路要冲的包括原西州回鹘(高昌回鹘)之地在内的西域地区,不仅是回鹘文字文化最繁盛之地,更是景教向东发展的一大基地。看来,在探讨汪古部景教渊流时,有必要把目光投向西域。

二、汪古部五大代表性集团渊流

关于汪古族源,以往有王国维、白鸟库吉的达靼—蒙古说,箭内互、樱井益雄所持的突厥说,小野川

① 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 67—72 页:“Nestorian Inscription from China (13th-14th Centuries)”, pp. 311-316。盖山林、唐莉、魏坚与张晓玮认为该墓碑使用文字除汉文、叙利亚文外,第三种文字为蒙古文。见盖山林《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86 页;Li Tang “Nestorian Relics in Inner Mongolia”, p. 77;魏坚、张晓玮《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边疆考古研究》第 14 辑,2013 年,第 193—194 页。笔者确认牛汝极给出的图版,当以牛先生之观点为正。

② 主要参见[日]佐伯好郎《元主忽必烈が欧洲に派遣したる景教僧の旅記》,东京:春秋社,1943 年,第 216—219 页;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香港:中国学社,1966 年,第 232—233 页;P. G. Borbone, “Some Aspects of Turco-Mongol Christianity in the Light of Literary and Epigraphic Syriac Sources”, *Journal of Assyrian Academic Studies*, vol. 19, no. 2, 2005, pp. 12-14。

③ P. G. Borbone, “I Vangeli per la Principessa Sara, Un Manoscritto Siriaco Crisografato, Gli Öngüt Cristiani e il Principe Giorgio”, *Egitto e Vicino Oriente*, vol. 26, 2003, pp. 63-82 “Some Aspects of Turco-Mongol Christianity in the Light of Literary and Epigraphic Syriac Sources”, p. 18。

④ 泉州地区的景教墓碑等,主要参见 S. N. C. Lieu, L. Eccles, M. Franzmann, I. Gardner & K. Parry (eds.), *Medieval Christian and Manichaean Remains from Quanzhou (Zayton)*; 牛汝极《福建泉州景教碑铭的发现及其研究》,《海交史研究》2007 年第 2 期,第 1—48 页。

⑤ 不否认部分回鹘人或汪古人还具备汉语、契丹语、女真语、蒙古语等其他语言文字的能力。如白塔 Text N 回鹘文题记在正文 taqïyü yïl törtünç ay nïng biş y[a]ng iqa tong aars[la]n bitidim“我,同娥阿萨兰,写于鸡儿年四月五日”后,写有汉字“戏笔”。见白玉冬、[日]松井太:《フフホト白塔のウイグル語題記銘文》,第 9 页。

秀美的羌族说等^①。系统研究汪古历史的周清澍的结论是,汪古同克烈、乃蛮是族属接近的突厥语族集团,是由残留在阴山一带的漠北回鹘汗国余部、沙陀人、金初释放的回鹘俘虏及其他民族成分组成,但以回鹘可汗统治下的操突厥语部落遗裔占主要地位^②。盖山林最初通过对比汪古领地与新疆等地的景教铭文遗迹,推定汪古部主要是辽金以来来自新疆的回鹘人^③,惜未提供确凿证据及相关考证。后来,他对史料记录的汪古部四大部落来源逐一进行了分析,强调阴山南北的汪古人有可能“系出沙陀”,同时认为原居于阴山南的突厥和沙陀与唐末由漠北而来的回鹘人,共同组成了汪古部^④。唐莉(Li Tang)、M. Paolillo以及魏坚与张晓玮的研究亦注意到了上述周先生提出的汪古与回鹘之间的关系,其中M. Paolillo还推定沙陀突厥中的景教徒粟特人与汪古人之间存在渊源关系^⑤。

诚如前文介绍,笃信景教的汪古人使用回鹘文字与叙利亚文字。虽然不敢肯定使用回鹘文字者定为回鹘人,但汪古部的主体为突厥语族景教徒则是无疑的。是故,关于汪古渊源的上述学界主流观点,笔者大体表示赞同,然相关细节仍有探讨余地。此处,笔者按金元时期史料记录的汪古部五大代表性集团,分类稍加讨论。

1. 黑水汪古:即以阴山南北的天德军丰州城、敖伦苏木故城为主要活动中心的汪古本部。其代表家族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也即汪古部统治家族^⑥。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阎复作《驸马高唐忠献王碑铭》言“谨按家传,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始祖卜国,汪古部人,世为部长。”^⑦高唐忠献王即阔里吉思,是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曾孙,“沙陀雁门节度”是指沙陀突厥首领李克用。上文所言“家传”,是否包括文字资料,不得而知。在探讨汪古部与沙陀突厥间关系时,建于至正十五年(1355)的山西代县《柏林寺晋王影堂碑》,可给予我们更多启发。该碑文谈到汪古首领奉李克用为远祖,并对晋王陵与晋王影堂加以维护。在介绍完李克用父子功绩及李克用葬于该地后言“皇元启祚朔庭,太祖皇帝天兵南征,王□□阿剌忽[思]惕吉忽里主□□□□□□□□,敬阅谱谍,知王□□□祖,遂□□祠祀,□□□功德主焉。”^⑧《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言“既平乃蛮,从下中原,复为向导,南出界垣。”对比上引二文,不难发现,前者“敬阅谱谍”当是阿剌兀思“从下中原,复为向导”之结果。其敬阅的谱谍,只能是记录李克用家族世系的材料,应包括在中原流传的关于李克用出自沙陀突厥的相关资料。看来,在“从下中原”之前,阿剌兀思并不了解沙陀与汪古之关系,其手上并无有关李克用后人流入阴山并发展壮大等相关记录。《元史·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明记其从征南下、归镇本部后,“为其部众昔之异议者所杀,长子不颜昔班并死之”。可见,在“从下中原”前后,阿剌兀思在汪古部内的统治难言安稳。鉴于此点,属于孤证的“系出

① 相关归纳与介绍,主要参见周清澍《汪古的族源——汪古部事辑之二》,《文史》第10辑,1980年,第101、116页注释2—5;盖山林《阴山汪古》,第3—5页;魏坚、张晓玮《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第193—194页。兹不赘述。

② 周清澍《汪古的族源——汪古部事辑之二》,第108—116页。

③ 盖山林《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第87—89页。

④ 盖山林《阴山汪古》,第3—20页。

⑤ Li Tang “The Turkic-Speaking Ongut Area”, i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 pp. 98-105; M. Paolillo, “White Tatars: The Problem of the Origin of the Öngüt Conversion to Jingjiao and the Uighur Connection,” in: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pp. 240-249; 魏坚、张晓玮:《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第194—196页。

⑥ 关于汪古部政治中心变迁之研究,参见石坚军、张晓非《元初汪古部政治中心变迁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期,第112—122页。

⑦ 《元人文集珍本丛刊》第2卷,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547页。又见《元史》卷118《阿剌兀思剔吉忽里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923页。

⑧ (光绪《代州志》卷6,第19叶。感谢北京大学历史系曹金成博士专为查找核对。又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第4册卷39,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6叶内容大同小异。录文又见周清澍《汪古的族源——汪古部事辑之二》,第101—102页。引文中,□表示能够确定个数的缺损文字。

沙陀雁门节度之后”亦存在是“从下中原”、“敬阅谱谍”之后的阿剌兀思,为提高其在汪古部中的统治优势而夸大其词的可能性。或许,诚如 M. Paolillo 所推测,笃信景教的汪古人与沙陀突厥中的景教徒粟特人之间存在某种渊源。

显然,周先生意识到上述“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存在疑点,故对“始祖卜国”格外关注,并将其视作回鹘祖源传说中的卜古可汗,进而将汪古与南迁回鹘后裔联系在一起。不过,以西州回鹘祖源传说最具代表性的卜古可汗传说,很难肯定在漠北回鹘汗国时期即已经开始流传^①。笔者并非断然否定汪古人与南迁回鹘部落之间的潜在关系。笔者的看法是,以西州回鹘为主要流传地的卜古可汗传说渗透到汪古部内,其背景是西州回鹘与汪古部内占据统治地位的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2. 东胜汪古:元东胜州故城位于今呼和浩特南托克托县。如前所述,朝圣巴格达的景教僧马古斯为东胜人,同时他还被记录为“回鹘人”。马古斯西行时,曾受汪古部首领君不花和爱不花接见。看来,东胜汪古与黑水汪古保持着密切联系,至少有部分东胜汪古人肯定属于突厥语族。

3. 耶律氏汪古:上世纪 20 年代末,西北科学考察团曾对四子王旗王墓梁陵园景教古墓群进行调查,并在此地发现元代耶律公神道碑。此碑现存内蒙古博物院,共 28 行,字迹漫漶。幸有盖先生整理,现转录第 6 至 11 行如下^②。录文中,[]与□分别表示个数不能确定与能够确定的缺损文字。

⁶耶律[]之祖□尉公讳保,[]西域帖里薛人[],当辽圣宗朝,授官不拜[]加太尉开府仪同三司,改姓曳刺氏[]。⁷□壳□居则以[]耶律氏附[]⁸□既得彼国之[]中[]可遂盛[]进封[]正隆间生孙子春子成[]⁹国朝阿□□延□□咸[]中[]尽拔之,遂以[],太¹⁰祖诏复耶律氏,[]公主闻其贤[]遣使召至位下,授以官,辞不就,□。¹¹年七十二无病而卒,生平[]月二十三日之[]人□当逝[]公讳子成[]

从上文可知,墓主为耶律子成,其祖先为西域帖里薛人,即迭屑,亦即基督教徒^③。从辽圣宗朝(983—1031)到契丹,并被赐契丹国姓曳刺(耶律)。王墓梁陵园景教古墓所见叙利亚文又多见于中亚七河流域与阿力麻里^④。耶律子成祖先故里,自然让我们联想起中亚的七河流域与阿力麻里。

4. 马氏汪古:金元之际,净州(静州,遗址在今内蒙古四子王旗乌兰花镇)天山县出身马庆祥家族信奉景教,经伯希和、陈垣等学者详考^⑤,已成学界定论。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的元好问撰《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载“君讳庆祥,字瑞宁,姓马氏,以小字习里吉斯行。出于花门贵种,宣政之季,与种人居临洮之狄道,盖已莫知所从来矣。金兵略地陕右,尽室迁辽东……又迁净州之天山。”^⑥上文中,“出于花门贵种”的花门视作回鹘,不悖于理^⑦。元人黄潜《马氏世谱》云“马氏之先,出西域聂思脱里贵族。始来中

① 白玉冬《契丹祖源传说的产生及其与回鹘之关系考辨》, *Journal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vol. 5, 2013, pp. 28-30。

② 盖山林《元“耶律公神道之碑”考》,《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 年第 1 期,第 78—80 页。

③ 迭屑指基督教徒,主要参见[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年,第 62 页;Li Tang, “The Term “Diexie”(Persian: Tarsā; 迭屑)”, i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Mongol-Yuan China*, pp. 52-53。

④ 关于中亚地区景教墓碑的介绍,主要参见牛汝极《中亚七河地区突厥语部族的景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7 期,第 163—181 页;[俄]科科夫措夫著,陈开科译《阿力麻里出土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墓碑碑文考释》,《西域文史》第 2 辑,2007 年,第 245—254 页;牛汝极《新疆阿力麻里古城发现的叙利亚文景教碑铭研究》,《西域研究》2007 年第 1 期,第 74—80 页;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 57—66 页;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 7 期,1983 年,第 67 页。

⑤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第 55—56 页;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初版 1923 年),第 18—23 页。

⑥ 《遗山先生文集》第 27 卷,《四部丛刊初编缩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272—273 页。相关描述亦见于《金史》卷 124《马庆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2695 页。

⑦ 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62 页。

国者和禄采思……辽主道宗咸雍(1065—1074)间,奉大珠九以进。道宗欲官之,辞不就,但请临洮之地以畜牧。许之。遂家临洮之狄道,和禄采思生帖穆尔越歌,以军功累官马步军指挥使。为政廉平而有威望,人不敢斥其名,惟称之为马元帅,因以为氏。帖穆尔越歌生伯索麻也里束,年十四而辽亡,失父母所在,为金兵所掠,迁之辽东,久乃放还,居静州之天山”云云^①。

据上引黄潜文,可知马氏祖先为西域景教贵族出身。结合元好问所言“出于花门贵种”之花门可理解作回鹘,则把马氏祖先视作西州回鹘属下景教贵族最合文义。陈垣先生以为“曰‘出于花门贵种’是误以聂斯脱利为回鹘”^②,或是未注意到西州回鹘辖下景教徒的存在。而关于其马姓,盖先生主张来自帖木尔越歌官职马步军指挥使,窃以为应来自叙利亚语 Mar“主教”^③。结合元好问与黄潜文之文,可知马氏祖先在11世纪中后期移居到临洮一带,宋徽宗政和(1111—1118)、宣和(1119—1125)年间,与同部落人住临洮,后被金人迁往辽东,最后放归在四子王旗一带。

临洮自古为西北名邑,陇右重镇,北连兰州,西通西宁(时称青唐城),进而经丝路南线河南路西入今新疆,或北上入河西走廊。可推定为出自西域景教贵族的马氏先人与同部落人入居临洮,应与西州回鹘等西域地区居民利用河南路前往内地有关。

5. 巩昌汪古:金设巩州置(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其辖境内亦有汪古人。《元史》卷155《汪世显传》载“巩昌盐川人,系出汪古族。仕金,屡立战功,官至镇远军节度使,巩昌便宜总帅。金平……始率众降。”^④盐川,即今甘肃漳县盐川镇。元姚燧为汪世显子汪忠臣所撰《便宜副总帅汪公神道碑》云“公王姓,由大父彦忠世汪骨族,故汪姓。”^⑤至元初王鹗为汪世显次子汪德臣所撰《汪忠烈公神道碑》言“汪本姬姓,宋末金初,世掌盐川之一隅汪古族,因氏焉。”末尾铭文又云“西州著姓,因官氏汪。”^⑥此处,姚燧与王鹗虽云汪姓之本姓为王姓或姬姓,但二者均把汪姓视作汪古之汪,不谋而合。虽然汪彦忠上世情况不详^⑦,但至少其本人在金初即为巩昌汪古部族之首领,即巩昌一带当存在汪古人,此点无疑。而巩昌与众所周知的阴山地区的汪古部之间,五代宋辽时期间隔有党项与吐蕃残部。若西夏时期曾被移民则另当别论,否则,巩昌汪古人出自阴山地区的可能性似乎不大。

对比发现,巩昌汪古人所在地与前面介绍的马氏汪古原居地临洮同属洮河流域,二者紧邻。汪世显父汪彦忠系宋末金初之人,与马庆祥祖父迭不儿越哥系同时代人。而迭不儿越哥“以军功累官马步军指挥使”。或许,正是迭不儿越哥在金初的战乱中战败,家族被遣散之后,汪彦忠才崭露头角,一跃而成金代巩昌汪古部族之首领。至于其家族“西州著姓”的“西州”虽存在代指陇西的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代指唐代以来的西州,即西州回鹘之西州的可能。如是,即便汪世显家族原本不是汪古人,但其属下的汪古人,与其视作出自党项与吐蕃残部以北的阴山一带的汪古部,毋宁视作与马氏汪古先人同出自西域,似乎更合情理。

以上,笔者对黑水汪古、东胜汪古、耶律氏汪古、马氏汪古与巩昌汪古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其中,黑水汪古,虽然其“系出沙陀雁门节度之后”的“家传”存在夸大之嫌,但其家族流传的始祖卜国即是以西州回鹘祖源传说为最具代表性的卜古可汗传说之卜古。而东胜汪古看起来属黑水汪古统辖。耶律氏汪古与马氏汪古的族源,如史料所述,来自西域。至于巩昌地区的汪古人,相比阴山地区的汪古本部而言,

① 《金华黄先生文集(元刻本)》第43卷《世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2页。

② 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第20页。

③ [日]佐伯好郎《支那基督教の研究》第2卷,第150页;殷小平《元代也里可温考述》,第182—185页。

④ 《元史》,第3649页。

⑤ 《元文类》下册,第6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898页。

⑥ 《陇右金石录(十卷附校补一卷)》卷5,兰州: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1943年,第601、603页。

⑦ 有学者认为汪氏非汪古族。相关介绍及批判见汪楷《元朝巩昌汪氏的族属探秘》,《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第47—52页;汪受宽、汪小红《可信与不可信——对漳县〈汪氏族谱〉的剖析》,《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42—48页;汪受宽《巩昌汪氏的族属及其与徽州汪氏的通谱》,《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72—77页。

与其近邻临洮马氏汪古部落同出自西域的可能性更大。

总之,笔者对汪古五大代表性集团渊流的分析,或多或少都反映他们与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域地区有着联系。这与第一节得出的结论——探讨汪古人景教渊流时有必要把目光转向西方,殊途同归。那么,金元之前,汪古先人有无从西域迁入内地的可能呢?

三、宋辽之际西域景教的向东发展

西域(此处指以今新疆、中亚为主的狭义上的西域)地处丝路要冲。与历史上的佛教、摩尼教、祆教等相同,景教在唐元时期前后二度传入中原之前,首先是在西域扎根发芽。关于包括景教在内的基督教向东方的传播,伯希和早年进行了系统介绍^①。明甘那(A. Mingana)依据东方教会相关叙利亚文材料,最早给出了基督教在内亚突厥人中传播的大致情景^②。Erica C. D. Hunter 以及 Maria Adelaide 和 Lala Comneno 则进行了补充^③。而且,据《伊朗学百科全书》以及刘迎胜等学者的研究,我们已经充分了解到蒙元及之前景教在中亚与新疆、河西地区、宁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流传及其分布情况^④,即关于景教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区的传播,我们已经知其然。在此基础上,透过表面现象,尽可能达到知其所以然,这是当前景教传播问题研究的关键所在。就此点而言,笔者以为,汪古部的景教信仰是一极佳的例子。

作为宋辽之际西域新疆的主体民族,回鹘西迁后,其王室初期仍信奉漠北以来的国教摩尼教。不过,在与新疆当地的佛教、祆教等的同生共处之中,10 世纪以后,回鹘王室逐渐改信佛教。西州回鹘景教,正是在上述多元宗教的漩涡之中得以生存发展的。

关于西州回鹘景教教团及其宗教礼仪,与东西方景教徒间的联系及敦煌吐鲁番出土基督教文献等,陈怀宇作了详细考察^⑤,荣新江则就相关文献进行了补述^⑥。而西姆斯—威廉姆斯(N. Sims-Williams)在对敦煌吐鲁番出土相关基督教文献进行考察后指出,当时可能存在使用粟特语与突厥(回鹘)语双语的基督教(景教)教团,当时的粟特人基督教徒正处于突厥化之中^⑦。总之,不论粟特人也好,突厥回鹘人也罢,当时西域的景教徒,在政治上大多隶属西州回鹘王国。在探讨汪古部景教源流时,我们应该考虑

① [法]伯希和《唐元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冯承钧《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49—70页(原载 *Young Pao*, vol. 28, 1914, pp. 623-644.)

② A. Mingana, "The Early Spread of Christianity in Central Asia and the Far East: A New Document", 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 9, no. 2, 1925, pp. 297-371. 中译文见牛汝极、王红梅、王菲合译《基督教在中亚和远东的早期传播》,收入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163—211页。

③ Erica C. D. Hunter, "The Church of the East in Central Asia", *Bulletin of the John Rylands University*, pp. 138-140; Maria Adelaide & Lala Comneno, "Nestorianism in Central Asia during the First Millennium: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Journal of the Assyrian Academic Society*, 2011, pp. 20-53.

④ "Christianity iii.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ese Turkestan", *Encyclopædia Iranica*, pp. 531-534; 刘迎胜《蒙元时代中亚的聂思脱里教分布》,第66—73页;盖山林《元代汪古部地区的景教遗迹与景教在东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第689—698页;陈玮《公元7—14世纪景教在宁夏区域发展史研究》,《敦煌研究》2014年第1期,第109—114页;李荣辉、袁刚《9—14世纪北方草原地区基督教初探》,《宗教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230—235页。

⑤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景风梵声——中古宗教之诸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2年,第58—103页;初刊《敦煌吐鲁番研究》第4卷,1999年。

⑥ 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139—142页;初刊吐鲁番学研究院编《土鲁番学研究:第三届吐鲁番学暨欧亚游牧民族的起源与迁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⑦ [英]西姆斯·威廉姆斯著,陈怀宇译《从敦煌吐鲁番出土写本看操粟特语和突厥语的基督教徒》,《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2期,第138—142页;王菲译《敦煌吐鲁番文献所记突厥和粟特基督徒》,载牛汝极《十字莲花:中国元代叙利亚文景教碑铭文献研究》,第212—220页。

五代宋辽时期,中国政权分立,但丝路贸易依然延续着之前的辉煌。这一时期,往返于西北地区与契丹或中原天朝之间的商人、般次,往往与其所隶属的政治集团的使次并行^①。《宋会要辑稿》载太平兴国元年(976)5月,西州龟兹遣使易难,与婆罗门、波斯外道来贺^②。宋太平兴国九年(984)5月,“西州回鹘与波斯外道来贡”^③。上文的“波斯外道”,实为隶属西州回鹘的景教徒^④。敦煌出土回鹘语文书 P. 2988 + P. 2909号,是10世纪曹氏归义军时期出使敦煌的西州回鹘使臣书写的发愿文。其第7—8行言 tāngri tavγač qan tāngri u(y)γur qan yarliγinga“奉神圣的桃花石汗与神圣的回鹘汗之圣旨”,之后列举使节姓名。其中,与 Yaramiř İnanč都督、Maukā地略、Uluy将军、Mayaq 啜等并列,出现 Yoxnan 特勤、Yoxnan Maxu 啜、Yoxnan Biṛgä、Yoxnan Manyaq 啜等人名^⑤。这里的 Yoxnan 即约翰,来自叙利亚语 Yohanān,是景教徒常用姓名^⑥。景教徒出现在西州回鹘对外使团,不足为奇。因为在西州回鹘境内,景教生存于受王室尊崇的摩尼教或佛教的阴影之下,不论从景教的弘扬,抑或从景教徒在王国内地位的提 高而言,充当信使出使他国,均是一个良好的润滑剂。

这一时期,活跃于内亚广袤地域的粟特系商人还从事非官方贸易,其足迹遍及漠北与契丹^⑦。作为记录丝路商人鲜活贸易画面的资料,敦煌出土文献中包括一批回鹘文与粟特文的书信、账本和笔记等。关于这批文献,森安孝夫与吉田豊二位最早向学界进行了介绍^⑧。翌年,哈密屯(J. Hamilton)著《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回鹘语文书》及其与西姆斯—威廉姆斯的合著《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突厥粟特语文书》正式出版^⑨。前者共收入回鹘文书信、账单等36篇,后者共收入包括两篇基督教徒手稿(P. 28文书与 P. 3134背面文书)在内的粟特文书信等8篇。现介绍转引部分文书。

前者《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回鹘语文书》所收第20号文书,即伯希和藏第15号回鹘文书,是10世纪回鹘商人从外地寄往沙州,或从沙州寄往外地的信函手稿^⑩。该封信是希力克(Silig)以希力克、葛啜(Qar Čor)、瓦兹(Vazīr)三人名义写给其嫂子阿勒屯(Ältun)的。此前,希力克、葛啜,可能还包括其死

① 张广达:《唐宋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35—340页;初刊《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② 《宋会要辑稿》蕃夷4《龟兹》,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7720页;郭声波点校:《宋会要辑稿·蕃夷道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1页。部分学者认为龟兹回鹘有别于西州回鹘。如钱伯泉:《龟兹回鹘国始末》,《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100—110页。然引文之前,《宋会要辑稿》言“或称西州回鹘,或称西州龟兹,又称龟兹回鹘,其实一也”,这是时人的理解。关于龟兹回鹘隶属西州回鹘的考证,主要参见田卫疆:《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西域研究》2003年第1期,第8—15页。

③ 《宋史》卷4《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2页。

④ 陈怀宇:《高昌回鹘景教研究》,第89页;王媛媛:《五代宋初西州回鹘“波斯外道”辨释》,《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75—86页。

⑤ J. Hamilton, *Manuscrip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textes établis, traduits*, Paris: Peeters, 1986, pp. 109-110.

⑥ O. F. Sertkaya, “Zuden Namen türkischer Christen in verlorengegangenen altuigurischen Urkunden”, pp. 385, 392-392; P. Zieme, *Altuigurische Texte der Kirche des Ostens aus Zentralasien*, p. 187.

⑦ [日]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のウイグル商人—ソグド商人とオルトク商人の間—》, [日]樺山紘一等編:《中央ユーラシアの統合》(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1), 东京:岩波书店,1997年,第110—111页;荣新江:《9、10世纪西域北道的粟特人》,第132—135页。

⑧ [日]森安孝夫:《ウイグル語文献》, [日]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献), 东京:大东出版社,1985年,第1—98页; [日]吉田豊:《ソグド語文献》, [日]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6》(敦煌胡語文献), 第187—204页。

⑨ J. Hamilton, *Manuscrip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N. Sims-Williams &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90.

⑩ 相关释读参见 J. Hamilton, *Manuscripts Ouïgours du IX^e-X^e siècle de Touen-Houang*, pp. 109-110; 牛汝极、杨富学:《敦煌出土早期回鹘语世俗文献译释》,《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17—19页。笔者对上述释读,大体表示赞同,个别细微差异,容另文详述,兹不赘述。

去的哥哥一起到达于都斤(Ötkän,即 Ötükän)地方。之后,瓦兹也赶到于都斤地方与他们会合。接下来,希力克、葛啜要前往沙州西南的仲云(Čüngül,即 Čüngül),之后从仲云赶往甘州(Ġnčiu)。就该封信出自敦煌而言,最大可能是希力克一行从于都斤前往仲云时途径沙州,并在沙州写下了这封信。而于都斤(Ötükän > Ötkän)是指漠北杭爱山一带。前辈学者早已指出,于都斤山在 10 世纪时期应在九姓达靼居地范围内^①。

另,哈密顿编号为 23 的回鹘文书,是 Bäg Yegän“匍易言”与 Bay Totoq“巴依都督”写给他岳父 Soydu Bäg“粟特匍”及其家人的。其中提到 baban čor elitmiş tavar üčün baban čor qıtayqa barır ärmış“巴班啜由于带来的财物,巴班啜去了契丹”。这说明,巴班啜前往契丹是为了销售其带来的财物。

后者《敦煌出土九至十世纪突厥粟特语文书》所收 P. 28 粟特语文书,是从外地送达敦煌或从敦煌送往外地的书信之一部分。其第 1—10 行大意如下^②:

¹……并且进入了这个王国。至于衣物(?)【】²因某种原因【】-cykw,我获得了五份债务(即负
债了)。[由于?]此五份债务,³我被痛苦折磨(?)。这个王国的人们,[进入了(?)]诅咒的浅滩(?)
里。⁴不知信仰与神!我对突尊将军负债了(?)。[中略]⁷⁻⁸现在突尊将军去外面(即外国)了。因
此,他的所作所为,你以自身明了(即你是其证人)。我把我的五份债务,均等地送出去了。⁹我因如
下理由,没能送出那个物品。雄骆驼在达靼(在达靼国)跑掉,并[离开了?]商队。¹⁰一边说,一边在
祈祷,希望它(即雄骆驼)能够出现在 nym'ynck'n 的王国!……。

据“不知信仰与神!”(δγνβγγ L'-r(β)yny)这一表达方式,可知上引 P. 28 书信作者是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即景教)教徒。关于他在文书第 9 行中提到的雄骆驼逃掉一事,原著法译文作“向达靼”。笔者专此讨教吉田豊教授。据其介绍,按粟特语原文之意,应译作“在达靼”更为正确。换言之,该书信的作者曾去过达靼之地。关于文中提到的达靼,《突厥粟特语文书》著者在其词注中指出^③,其所指乃是沿甘肃省北部沙漠地区的达靼人控制之地,并引用敦煌出土于阗语 P. 2741 文书,介绍甘州、肃州之间曾存在达靼人。不过,考虑到前面介绍的伯希和藏第 15 号回鹘文书记录 10 世纪时期回鹘商人前往漠北达靼之地于都斤,且很难认为 10 世纪时期曾存在“河西达靼国”^④,笔者以为,将上引 P. 28 粟特语文书记录的回鹘商人去过的达靼视作漠北的达靼部落于理不悖。

P. 3134 背面粟特语文书是有关粟特语称为 rayzi,突厥语称为 qars,汉语称为褐子的毛织品账本^⑤。据其第 7 行“以神的名义”(r βγ'yn'mδβrw),文书作者被认为是景教徒^⑥。文书中作者所接触的交易对象,除带有突厥语名称的人物之外,还包括汉人以及来自达靼的押牙、焉耆的粟特人和于阗都督等。其中,来自达靼的押牙在第 22 行以回鹘文回鹘语记作 tatardīn kālmiš amγada sākiz qars alt[īm]“从来自达靼的押牙处,[我]获得了 8 个(红色?)毛织品”。张广达先生指出,唐末至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贸易,其重要的从事者一般为官员或使节^⑦。上述达靼押牙极可能是代表达靼国从事公务贸易的使节。重要的是,我们在这里能够确认到,粟特系景教徒商人确切地在与当时的草原游牧民之代表达靼人进行着

① [日]前田直典:《十世紀時代の九族達靼—蒙古人の蒙古地方の成立—》,《元朝史の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73 年,第 239 页;初刊《东洋学报》第 32 卷第 1 号,1948 年;陈得芝:《十三世纪以前的克烈王国》,《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215—218 页;初刊《元史论丛》第 3 期,1986 年。

② N. Sims-Williams &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siècle de Touen-Houang*, p. 41. 译文中,⋯表示无法认读的残存文字,【】为文书残损部分,()与[]内文字分别为原著者的补充说明与推测复原。

③⑤⑥ N. Sims-Williams & J. Hamilton, *Documents Turco-Sogdiens du IXe-Xesiècle de Touen-Houang*, pp. 45, 23-25, 23.

④ 相关论述,参见白玉冬:《于阗文 P. 2741 文书所见达靼驻地 Buhāthum 考》,《西域文史》第 2 辑,2007 年,第 235—238 页;白玉冬:《十至十一世纪漠北游牧政权的出现——叶尼塞碑铭记录的九姓达靼王国》,《民族研究》2013 年第 1 期,第 83—84 页。

⑦ 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第 335—340 页。

交易。

综上所述,笔者介绍的文书,虽然只是敦煌出土粟特文与回鹘文贸易相关文书的一小部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这些文书了解到10世纪时期,包括景教徒粟特系回鹘人在内的回鹘商人,与达靼和契丹保持着联系。《辽史》记录不带有所属地的单独的回鹘频繁入贡。这些回鹘,应视作从事官私朝贡贸易的丝路贸易回鹘商人^①。把·赫卜烈思著《教会编年史》(*Gregorii Barhebraei Chronicon Ecclesiasticum*),记录漠北的克烈国王在11世纪初带领部众改信景教^②。笔者的看法是,对克烈部改信基督教而言,如上述粟特文P.28文书与P.3134背面文书所反映,西州回鹘出身的景教徒回鹘商人所起的作用更大。反观阴山地区的汪古部,诚然有部分出自之前已在当地留存的突厥和回鹘残众,但其中的耶律汪古,无疑是辽代来自西域的景教徒后裔。至于汪古本部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以及东胜汪古,据前面介绍的相关出身背景之分析,他们或多或少与包括今新疆在内的西州回鹘有关。而上引敦煌出土粟特文、回鹘文文书表明:以西州回鹘出身者为代表的活跃在内亚丝路贸易舞台的粟特系回鹘商人确切地在包括达靼之地、契丹等在内的广袤地区从事着丝路贸易。而且,阴山一带的汪古人行回鹘文,同时通叙利亚文。参此而言,上述前往东方的粟特系回鹘商人最终落脚在阴山一带,不无可能。

不过,关于西州回鹘景教势力的向东发展,还没有资料证明这一行动是在王国统治阶层的推动下完成的——如同安史之乱后摩尼教在中国内地的扩张。虽然如此,就元代畏兀人中存在不少景教徒而言,景教在西州回鹘境内并未受到限制,相反,还获得过某些支持。看来,西州回鹘景教教团的活动,与西州回鹘部众的向东发展,难言不无关系。

关于西州回鹘(史料又称为龟兹回鹘)使团利用河南道,即柴达木盆地东经青唐(今西宁)、秦州(今天水)通使中原,甚至入居的史料,主要见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0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6月条,卷126仁宗康定元年(1040)3月条,卷127仁宗康定元年(1040)4月丁亥条,卷128仁宗康定元年(1040)8月癸卯条,卷131仁宗庆历元年(1041)4月壬午条、甲申条,卷135仁宗庆历二年(1042)2月庚辰条以及《宋会要辑稿》蕃夷4《龟兹》。西州回鹘的上述活动,与宋朝、吐蕃唃廝罗政权、西夏三者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密切相关;同时,亦与沙州回鹘集团的出现干系极大。关于该问题的讨论有偏离本文主旨之嫌,笔者只能割爱,此处仅给出笔者的看法。洪皓《松漠纪闻》云“回鹘自唐末浸微,本朝盛时,有入居秦川为熟户者。女真破陝,悉徙之燕山。”^③这是对以西州回鹘为主的西域移民主要利用河南道迁入宋朝内地的高度概括。当然,上述迁移应与宋朝针对西北各部族所采取的招诱等政治军事政策密切相关。就前面介绍的马氏汪古是在11世纪时期移入临洮而言,自包括西州回鹘在内的西域抵达河湟地区甚至内地的这些回鹘移民中,当包括马氏汪古、巩昌汪古等部分景教人物。而马氏汪古先祖在辽道宗朝进贡辽朝,应当与当时契丹向河湟地区的势力渗透有关^④。至于其被女真迁往辽东,亦与洪皓所述相符。

综上,10至11世纪,包括景教徒在内的西州回鹘辖下粟特系回鹘商人,积极参与到丝路官私贸易中,其足迹遍及河西、漠北、契丹、陇西、宋朝内地等。景教在汪古部中的流传,与西州回鹘辖下景教徒商人的活动和景教教团势力的向东发展,应有密切关系。笔者以为,就渊源而言,汪古部中虽包括部分突厥人与回鹘人之后裔,但将其统治阶层视作出自西域的景教贵族,似乎更合情理。

① [日]代田贵文:《カラハン朝の東方発展》,《中央大学大学院研究年報》第5辑,1976年,第257页,第268—269页尾注6。

② 有关改宗,主要参见D. M. Dunlop, “The Karaites of Eastern Asia”,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11, no. 2, 1944, pp. 277-278; 罗香林《唐元二代之景教》,第156—157页。

③ 《松漠纪闻》卷1,清嘉庆十年照旷阁本,第5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07册,第696页。

④ 相关讨论参见[日]长泽和俊《辽代吐蕃遣使考》,氏著《シルクロード史研究》,东京:国书刊行会,1979年,第340—346页。

余 论

关于汪古之名,有意见认为出自蒙古人对金界壕的称呼 Ongou,或蒙古语神之意的 Ongon“翁衮”^①。不过,距离黑水汪古相当遥远的陇右巩昌汪古,亦被称为汪古。显然,巩昌汪古之汪古,难以用上述蒙古语 Ongou 或 Ongon 来解释。而且,马可波·罗记录天德州的人们自称 Ung,叙利亚语文献记录汪古人为 *wyngy* = *Öngāyē*,其中的 -āyē 为复数词缀^②。

笔者认为,汪古统治阶层可视作留居在东方的出自包括西州回鹘在内的西域景教贵族,而且,如周清澍先生所考证,汪古部中当包括时属东部突厥语族的沙陀突厥与回鹘之后裔。尤其是相对西州回鹘等西面的突厥语族集团而言,阴山地区与陇右同属于东方。笔者推测,汪古名称或源自回鹘语 *öng*“东方、前方”,巩昌汪古“因官氏汪”的“汪”,或出自此 *öng*。如此,则笼罩在巩昌汪古与黑水汪古之间的地理空间上的龃龉,也便迎刃而解。

关于五代宋辽金时期丝路沿线内亚不同地域间的宗教文字文化的交流本相,因史料欠缺,难言得到了充分研究。本文旨在抛砖引玉,谨望学界同仁不吝赐教,推陈出新。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张慕华】

① 相关介绍,见盖山林:《阴山汪古》,第1—2页;魏坚、张晓玮:《阴山汪古与景教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第193—194页。

② P. G. Borbone, “I Vangeli per la Principessa Sara. Un Manoscritto Siriaco Crisografato, Gli Öngüt Cristiani e Il Principe Giorgio”, p. 75; “Some Aspects of Turco-Mongol Christianity in the Light of Literary and Epigraphic Syriac Sources”, p. 18; [法]伯希和著,冯承钧译:《唐代时代中亚及东亚之基督教徒》,第62—63页。